



電影文化



电 影 文 化

第 一 辑

(总第三辑)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电影研究所《电影文化》编辑室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2 插页 147 千字

1981 年 4 月第 1 版 198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600 册

统一书号: 10190·053 定价: 0.62 元

青年演员张瑜近影。

刘延平摄

13617/2/21 18



于蓝在《革命家庭》中饰周莲。(上左)

于蓝在《烈火中永生》中饰江姐。(上右)

一九六四年于蓝与日本女演员
高峰秀子摄于长城。





目 录

电影喜剧的命运——悲剧·····	马德波 (1)
重敲“电影的锣鼓”·····	汪 巩 (15)

· 史 料 选 登 ·

电影的锣鼓·····	《文艺报》评论员 (26)
------------	---------------

· 探 讨 与 争 鸣 ·

电影形式和电影民族形式·····	钟惦斐 (32)
电影民族形式问题的浅见·····	严寄洲 (44)
电影民族化琐议·····	李少白 (49)
电影民族化的口号应该缓提·····	张维安 (54)
电影民族化的口号也是舶来品·····	马宗启 (60)
诚实的探索·····	郑洞天 (67)
——论影片《苦恼人的笑》的美学意义	
“意识流电影”辨析·····	胡承伟 (76)

· 关于美术片 ·

- 美术片这个片种..... 杨玉良 (84)
美术片的导演及其它..... 靳 夕 (91)

· 影 坛 漫 笔 ·

- 谜的启示..... 王愿坚 (98)
细微之处见功夫..... 王云缙 (104)
谈谈电影中的科学家..... 曲 川 (109)
电影演员不能满足于“演”..... 胡惠玲 (111)
“一窝蜂”..... 赵大年 (113)
从“离婚”说到“慎言”..... 行 人 (115)

· 创 作 札 记 ·

- 一个细节的诞生..... 吴贻弓 (120)
——《巴山夜雨》创作手记

· 外 国 电 影 ·

-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电影美学概说..... 李幼蒸 (124)
莫里哀和电影..... 南 海 (141)

· 基 础 知 识 ·

- 电影场面调度技巧..... 王运晖 (144)

电影词语浅释(三).....卮苏元 (151)

· 影 片 分 析 ·

《人证》从小说到电影的提炼.....史大千 (158)

· 电 影 人 物 ·

于蓝和她的表演艺术.....木 子 云 绶 (171)

国际影星三船敏郎.....傅昌文 (177)

· 观 众 之 声 ·

意见和希望.....古 月 (183)

——观众对当前国产影片的反映

电影漫画江永生 毕克官 李滨声 缪印堂

青年电影演员张瑜近照 (封二)

著名电影演员于蓝剧照和生活照 (封三)

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 (封四)

插页: 贺敬之、夏 衍、叶 楠、吴贻弓同志在《巴山夜雨》

座谈会上的照片和《巴山夜雨》、《怪客人》、《人证》剧照

封面设计 倪 震

电影喜剧的命运——悲剧

马 德 波

在电影艺术中，喜剧是最受群众喜爱和富有战斗作用的品种之一。可是，这种使人发笑，给人愉快，匡正时弊，有益于社会发展的重要艺术形式，在三十年间却历尽坎坷，备尝艰辛。喜剧遭到了悲剧的命运。

让我们把电影喜剧在三十年间的经历分阶段作一个概观，从中找出喜剧发展的障碍，对一些有关喜剧的理论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使电影喜剧能够按照它的特性健康地发展，在影坛上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并放射它应有的光芒。

从建国到 1955 年，在长达六年的时期内，没有一部喜剧片。这种情况说明电影喜剧在我国是一门难产的艺术。回顾当时的历史条件，“难产”有多种原因。例如，在 1949—1950 年，还是解放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的烽火年代，那时电影的题材集中于表现人民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业绩，是理所当然的。1951 年之后，国家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按常理应有喜剧片出现。但由于 1951 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审查制度转严，连一般正剧也很难通过，喜剧更无人敢于问津了。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在和平年代中有六年之久不见电影喜剧，不能不说是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文艺政策的缺点表现在把“为工农兵服务”解释为只能表现工农兵；文艺理论上的主要缺点则是强调只能

写光明。如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就是“在英雄身上找疮疤”;反映社会生活中的消极面,则是“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等。在这种条件下,喜剧当然是难产的。

一、讽刺喜剧的兴起、发展和绝迹

1956—1958年是电影喜剧抬头的时期。电影喜剧,特别是讽刺性的喜剧的兴起,有它的社会原因,外部影响和思想战线的具体形势等重要条件。

从社会原因来看:在建国最初几年,广大工农群众充满着翻身后的幸福感与自豪感,国家干部较好地保持着战争年代中的艰苦朴素的传统。对比之下,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的逐渐滋长,吹牛拍马、阿谀奉承、铺张浪费、弄虚作假等弊端的逐渐显露,都引起群众不满,这是讽刺喜剧兴起的社会原因。

那个时期,我国电影和文艺思潮受苏联影响很深。1952年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专论,反对“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继之,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我们需要苏维埃的果戈里与谢德林,让他们用讽刺的烈火烧尽生活中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垂死的东西,一切阻碍前进的东西。”之后,苏联于1954—1956年间拍摄了一批喜剧片,如《忠实的朋友》、《我们好象见过面》、《蜻蜓姑娘》等等。这些理论和影片对我国电影喜剧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国内思想战线、文艺批评战线上,自1953年以来,反对教条主义和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舆论逐渐兴起,强调真实性和“干预生活”的呼声渐高,这都是产生喜剧片的有利条件。

1956年,在刚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后不久,由吕班导演的第一部讽刺喜剧片《新局长到来之前》出世了,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鼓励。

同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继《新局长到来之前》又拍摄了《如此

多情》、《不拘小节的人》，上影拍摄了《落水记》。这一批作品带有实验性。《新局长到来之前》接触了反官僚主义的主题，讽刺了一个对生产和群众生活漠不关心，对上级逢迎拍马，借机谋取私利的牛科长；影片抓住了牛科长的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特征加以夸张，达到了一定的喜剧效果。看过这部影片的人至今还能记得牛科长为了给局长粉刷办公室，亲临指导，关照油漆匠要把墙壁刷成“冷色”，以至于在墙上画了许多西瓜的可笑情节。《不拘小节的人》、《如此多情》、《落水记》则从社会道德和情操方面嘲笑了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其风格近于通俗笑剧。虽然不乏有趣的笑料，但对生活的揭示较为表面，对于运用喜剧手段刻画典型人物还注意不够。但作为一个开端，这些缺点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

1957年完成了三部喜剧片，《未完成的喜剧》（长影）《寻爱记》（长影）《球场风波》（上影），在讽刺喜剧的创作上显示出了进步。《未完成的喜剧》通过三个小故事“朱经理之死”、“大杂烩”、“古瓶记”，讽刺了官僚主义者，牛皮大王，六亲不认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其中“朱经理之死”较为成功。它给剧中人物提供了一个喜剧情境：权势很大的朱经理出去疗养，回来时发现大厅内设着他的灵堂，秘书正在给他写悼词。朱经理则对悼词、花圈、棺材等横加挑剔。喜剧假定官僚主义者死了，但他在结尾时偏大喊大叫说：“我没有死，我还活着！”颇有寓意。全片还有一个贯串人物教条主义批评家“易浜紫”（谐音“一棒子”），他是影片着重讽刺的对象。他对于三个喜剧故事的“批评”，很有“用一棒子打死”的味道。这个形象相当具有典型性。可惜影片还没有很自然地把这个人物置于可笑的境地。

《未完成的喜剧》在讽刺喜剧的探索方面前进了一步。但这部影片还未出世就被宣布为毒草，作者和导演均被划为右派。直到今天也还没让这部影片和广大群众见面，名副其实地成了“未完成的”喜剧。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悲剧命运？

另一部被当作毒草遭到严厉批判的是上影摄制的《球场风波》。若从用喜剧揭示官僚主义者形象的角度来看,《球场风波》中的“疗械厂”主任张人杰较之牛科长、朱经理的形象更要丰满一些。张人杰对上卑躬屈膝,对下粗暴压制,对人蛮横无理,爱作“报告”,动辄几个小时,光是一个报告的标题就有四十八个字。周伯勋饰演的张人杰,表情、手势、步态都颇能引人发笑。

当时对《球场风波》的批判,其规模与声势虽不亚于任何一部“毒草”,但文章对编者尚称“同志”,以别于“右派”;对影片称“野草”以别于“毒草”。但是该片编剧唐振常自此再也没写电影剧本,导演毛羽以后再也没拍新的片子。

1958年喜剧片又比上年减少,只有郭维编导的《花好月圆》和杨履方编剧、黄佐临导演的《布谷鸟又叫了》。数量虽少,质量却提高了。这两部影片从真实性、思想的深刻性和结构的完整诸方面来看,均胜于前两年的喜剧。赵树理以他特有的幽默感,在小说《三里湾》中刻划了许多富有喜剧特点的人物和情节。郭维在改编和拍摄中相当成功地保持或发展了原作中为数众多的人物的特点,影片既有尖锐的讽刺,也有诙谐和风趣。《花好月圆》可以使我们在笑声中看到生活在发展、在变化。人们在笑声中与过去告别,在笑声中向新生活迈进。按照常理,这部影片应该受到赞扬,但它也遭禁映。批判者指责影片是“用三角恋爱代替了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但是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是:恋爱不但没有“代替”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相反地,恋爱处处反映着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当时只有批评或批判,没有反批评或反批判。这说明即使出现了成功的喜剧作品,也只能在毫无申辩权利的情况中被扼杀!

《布谷鸟又叫了》在1958年摄制完成,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影片准确地抓住了方宝山的主要特征——见物不见人,爱牲畜不爱人——大胆地加以夸张,讽刺的武器在这里显示了它的威力。影片没有把方宝山简单化,写了他关心生产,勤勤恳恳;但是对他的

错误作了辛辣的讽刺。影片成功地表现了“要关心人”的主题。

影片上映后立即遭到了批评,尽管也有肯定或辩解的文章,但批判相当凶猛,“上纲”很高,如“歪曲现实”,“歪曲了农村生活”,“丑化党的领导”等等,足以令人胆寒。作家和艺术家辛勤地创作出好的喜剧作品,有功无赏,反而加罪,还有谁敢再向喜剧问津呢?

于是,电影喜剧中的一个主要品种——讽刺喜剧,在短短的三年内,经历了兴起、发展和灭绝的历程。

二、“保险”的、崎岖的羊肠小道——歌颂性喜剧

在喜剧屡遭“迎头痛击”之后,电影界弥漫着一股子“闻喜生畏”,“谈喜色变”,“望喜生悲”的暗淡气氛。1959年初,当时电影界领导人在讨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题材计划时,发现竟没有一部喜剧。于是决心尽快“抓”出一部喜剧片,并由夏衍同志亲自负责扶植。这就是后来由季康、公浦编剧,王家乙导演的《五朵金花》。这部影片的成功是煞费苦心的。据季康同志在文章中介绍,夏衍同志在下达任务时“有五个要求:1. 要喜剧;2. 要有大理山水;3. 载歌载舞;4. 轻松愉快;5. 不要政治口号。”这是一条在当时条件下实际可行的趋吉避凶之路。趋吉,是只写生活中的光明面,使人轻松愉悦;避凶,则是避开生活中的阴影和消极面,避免讽刺和避开矛盾。影片把观众带到晴朗的阳光下,明媚的山水中,听着赏心悦耳的歌声,被一个青年寻找爱人的有趣故事所吸引。影片获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功。为了增加一点笑料,影片中有两个滑稽人物,有点插科打诨,但趣味尚不庸俗。即使如此,导演为了避免有人“对号入座”,还是小心翼翼地把编剧写的“从北京来的音乐家和画家”改成是“长影的音乐家和画家(因为影片由长影拍摄)。

尽管如此,对这部影片当时也并非没有责难。有人说,影片没

有表现党的领导，因为影片没有说明副社长金花是党员；有人说，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代，阿鹏为爱情到处奔跑，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吗？……幸而，当时在云南开展了一个“万朵金花”运动，说明《五朵金花》有积极的社会效果，这才使影片在政治上得到立足之地。

朝着趋吉避凶方向探索“社会主义新喜剧”之路的还有编剧李天济和导演鲁轲。他们在《今天我休息》中所付出的劳动，可以叹为观止！在“歌颂性”方面，《今》片比《五朵金花》做得更为彻底。影片展示了一个正面环境，全部都是正面人物，竭尽努力地去歌颂“新人新事新生活”。民警马天民在休假日去会女友，一再失约。因为他品质太高尚了，完全达到了忘我的程度。给马天民添麻烦的罗爱兰等，也都是好极了的热心人。

在一个完全正面的环境中，全是正面人物，没有社会矛盾，没有戏剧冲突而又要有使人发笑的喜剧效果，这对任何一个喜剧大师来说也是一个极端困难的课题，而《今》片居然不乏笑料，即使不说它是奇迹，也应当承认它是难能可贵的、独一无二的现象。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就象一个游泳运动员手脚都被捆上而居然能横渡长江。

实际上，《今天我休息》的“笑”，是在“太”字上做文章。太，就是过份，出格。因为他们好得超过常情，出乎观众意料，于是发出笑声，感到喜悦。作品中确有神来之笔。例如影片的结尾，一天在纷忙之中过去了，虽然一再失约引起误会，终于有了个圆满的结局。这时马天民松了一口气，观众也松了一口气。可是当他回到室内，开了电灯，意外地发现一个人，原来是理发师上门来为他理发。这不但出乎马天民的意料，也出乎观众的意料。好得出奇，这便产生了喜剧效果。

《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得到了观众的喜爱，评论界给予充分肯定，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们为“社会主义新喜剧开创了一条

新路”——“歌颂性喜剧”之路。但这并不是一条宽阔的路，而是一条“光明小道”，曲折、狭小而且崎岖。在这条路上，只有极微小的成功的可能。李天济同志在《今天我休息》之后，又动手创作一个新的喜剧片剧本，名叫《闯关》。这个名字很有象征意义，这个“关”，李天济同志始终没有能够“闯”过去。

三、关于“社会主义喜剧”的理论

评论界在对于《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欢呼了一阵之后，又不禁有些惶惑。特别是《今天我休息》，实际上是给理论界出了一个难题：既然这是一部成功的“社会主义新喜剧”，那么，新喜剧有些什么特点呢？于是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文汇报》还展开了近半年的讨论。

根据《五朵金花》和《今天我休息》的实践，评论界所总结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新喜剧”的主要特点有：

（一）其性质是歌颂光明。要求写正面环境，写肯定的积极的事物而不写否定的消极的事物；其态度是歌颂而不是暴露。通过笑肯定生活，证明生活是美好的，使观众热爱生活。笑，应当是“建设性”的，积极、健康而又起促进作用的笑。

（二）关于人物。认为社会主义新喜剧，主要应当塑造正面人物形象。这是由它的性质所决定的。只有创造出光辉的体现时代精神的正面形象，才能达到歌颂新时代、歌颂社会主义制度之目的。

（三）关于两部影片是否反映了社会矛盾和有无戏剧冲突，使评论者也陷入矛盾的境地。第一种意见认为歌颂性喜剧“突破了”喜剧的传统的讽刺的框框，它可以不反映敌我矛盾，也可以不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持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充满了种种欢乐，这就是歌颂性喜剧的客观基础。因此，《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的戏剧冲突是建筑在巧合、误会的基础上的。

第二种见解则坚持认为应当反映社会矛盾，并说这两部影片都是反映了社会矛盾的，是有戏剧冲突的。但对二部影片所反映的矛盾又其说不一，有的说是个人与集体的冲突，有的说冲突的实质是两种阶级思想的斗争。而所阐述的理由则并不足以服人。第三种见解亦坚持“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的原则，但是面对着的两部影片却居然没有冲突也有了戏剧！于是，他无可奈何地说：这是个别例外的情况！

（四）关于喜剧的技巧。既然肯定是要歌颂不要暴露，则讽刺被认为是“旧”的手法，已经不适用了，再搞讽刺是“要犯错误的”。于是肯定了诙谐、幽默、风趣以及误会、巧合等等为“歌颂性”喜剧的基本手法。

上述四个特点，除关于矛盾冲突的看法有显著分歧外，其他观点基本上一致或近似。这些特点也基本上符合《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的实际情况。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那一场讨论是认真严肃的，文章都力求说理和作具体分析。大家都希望为电影喜剧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其出发点是积极的。但是，问题出在更带根本性的方面。

这些有关“社会主义新喜剧”的理论和“歌颂性喜剧”的生命力，马上就面临着创作实践的检验。喜剧片创作是顺着《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所开创的“歌颂性”道路发展下去吗？它们按照上述有关“新喜剧”理论的指引获得了更光辉的成就了吗？

不。电影喜剧顺着第三条路发展下去了。

四、第三条道路——轻喜剧或生活喜剧

当讽刺喜剧在 1957—1958 年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与《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同时探讨出路的还有《小康人家》、《金铃传》、《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一条介于“讽刺性”与“歌颂性”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一般称之为轻喜剧或生活喜剧。实践证明，它在当时的

条件下是较为可行的路子。1962年,当“讽刺性”喜剧不能搞,“歌颂性”喜剧搞不了的时候,轻喜剧却得到了发展。1962年摄制的《李双双》、《女理发师》、《大李、老李和小李》、《锦上添花》等,基本上是属于轻喜剧类型的。

这一部分喜剧的作者承认生活中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承认“没有冲突便没有戏剧”的法则。但他们也接受了讽刺喜剧的教训,避开那些有危险的区域,如讽刺官僚主义等等。这些作品一般都有着光明的正面环境,但都不是没有阴影;有正面人物,但也有形形色色有错误思想的落后人物;它们都反映各种矛盾,有戏剧冲突,但严格地限制在“人民内部矛盾”范围之内,尽可能使之远离“危险地带”或“边缘地带”。其矛盾多表现为先进与落后之差异;其冲突多展开于父子、母子、夫妻或尚在恋爱中的爱人之间;其斗争则多采取规劝或说服的方式。其结局则无例外地皆大欢喜。

轻喜剧之所以“轻”,还可以简单地用四句话加以概括:有矛盾而不必尖锐;有冲突而不必激烈;有讽刺而不必辛辣;有歌颂而调子不必过高。

这第三条道路不象讽刺喜剧那样危险,也不象“歌颂喜剧”那么艰难。它较为宽阔,较为平坦。无怪乎自1962年以来(除“文革”十年之外)它成了电影喜剧的主流。1965年的《龙马精神》、《山村会计》,均属于轻喜剧的类型。“四人帮”被粉碎后,思想虽然逐步解放,但近年来的喜剧如《她俩和他俩》、《小字辈》、《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等也都在轻喜剧的范围内施展其身手。预计今后这种类型的喜剧在数量上仍将占多数。

但是,喜剧走到这一步,实际上是挨了许多棍子,经过某种程度的“异化”才找到这么一条可以自保的道路,这种状况不能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喜剧还应当有更崇高的目的和更重大的使命。

为此,有必要对喜剧的目的、性质和手段作一些初步探讨。